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

——以一个滇西南多民族的村寨实践为例

杨婧¹ 张涵¹ 李荣²¹

(1. 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99;

2. 普洱学院科学技术处, 云南 普洱 665099)

【摘要】: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农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滇西南多民族的村寨实践为例, 从家庭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农村经济活动的重要承担者、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接受培训的最多参与者等方面展示了农村女性社会角色变迁; 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是, 乡村振兴社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与外界交流, 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变化使得女性不得不学习新的生存技能, 外出务工者纷纷返回村寨把学到的新理念新技能活用于村寨发展; 研究发现, 政策、经济、教育力度的加强和积极的导向, 均对农村女性角色重构起到重要的影响。提出建议, 政府加强关注两性平等的顶层设计机制, 为农村女性村民搭建发展平台, 对整个乡村振兴建立积极正向的价值导向; 通过加强妇联等基层组织建设, 让农村女性村民在政策上有娘家的支持, 进一步发挥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优势, 抱团发展; 同时, 可结合地方高校主动融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 为当地两性提供他们所需的技能, 分性别地进行科技服务并建立当地人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村女性 社会角色 重构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2017年10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妇女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 更是推动者、建设者。作为乡村振兴重要主体力量的农村女性, 面临着非收入多维贫困问题, 这直接关系到个人及其家庭的发展, 成为返贫的潜在诱因,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严重影响。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进行转移, 农村女性由于家庭性别分工的递补效应, 成为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 从而凸显出农业女性化现象, 这使得进一步突出了妇女贫困的问题。因此, 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动、农村家庭性别分工以及女性社会角色变迁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滇西南P市一个多民族的N村的女性社会角色重构实践为例, 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及主要经济收入变化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农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起主要作用研究路径出发, 结合农村女性日常生活来深入剖析社会角色重构运作逻辑, 并尝试对当前农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实践提出一些反思。

作者简介: 杨婧(1981-), 女, 贵州黔东南人,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社会林业、女性与社会性别。李荣(1977-), 男, 云南普洱人, 硕士, 副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 社区林业, 林业政策。

基金项目: 云南农业大学院级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女性角色重构”(编号: 2019RYZD001)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社会角色变迁

1.1 “社会角色”的含义

“角色”的概念源于戏剧表演，指演员通过道具、化妆、场景等形式刻画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个性及其行为。“角色”这一概念自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于 20 世纪 20 年代用于社会结构研究之后，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最早提出并定义了“社会角色”的概念，认为社会角色是对人们在某种特定场合中的行为的期望或规范。社会角色的实质是人们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发生变化。

1.2 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男耕女织”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的影响，男性的社会角色是与工作和职业等公共领域相联系，而女性的社会角色则是从属于男性的。农村女性由于受历史、现实、社会、性别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导致长期以来的社会角色是形成“别人的附庸”。农村女性通常被认为是家务琐事的主要负责人，其社会角色被定位于家庭之中，加之能力的约束，其人缘关系通常比农村男性的狭窄。因社会角色的需要，与投入料理无报酬家务的时间和精力相比，农村女性投入在其他劳动的时间相对较少，其收入水平低于农村男性的情况。农村女性面临着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双重压力，最大难题是在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做选择，而影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农村女性的人口特征。

1.3 农村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女性发展，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率、参与意识、参与面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无论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村落日常生活和文化建设，还是在协调农村社会关系、规范农村社会行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女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村社区管理中，农村女性的部分精英不断提升政治参与度，进而逐渐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通过重新认识农村女性的性别价值，把农村女性培育成为新型女性职业农民，提升了农村女性的生产决策能力与经营管理水平。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女性开展乡村旅游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农村女性成为全域旅游业创新创业中的重要角色，开始追求高质量的家庭生活，其在家庭地位、社会角色等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作为主要的创业群体，农村女性开展乡村旅游创业的意愿意味着创业活动的开始，直接关系到农村女性的去留，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高农村女性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性别歧视状况，进而形成对农村女性创业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农村女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为乡村振兴提供长期的内生动力。总而言之，由于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流，农村女性正逐渐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力军，把农村女性从简单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激发、保障和发挥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力作用和作用，关注农村女性、提高农村女性的生产技能和提升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正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着力点。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等层面都有所呈现。基于此，本研究以滇西南 P 市 N 县 N 村为例，从两个维度来剖析女性角色：一个是内在因子，即女性对自身的要求等方面，包括女性受教育程度，作为母亲对孩子的抚育及期待，以及现代化家庭模式中家务劳动的承担；另一个是外在因子，即外界经济、政治、及人文环境等对女性角色重构的影响，包括主要收入来源的经营者、决策者，以及主要技能的获取等。

2N 村女性社会角色的重构实践

田野调查点为滇西南 P 市 N 县 N 村。N 村在清代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之一，现在是 N 县通往 P 市中心城区的交通要道，以国道 G213 线交通途径距 N 县城 18 公里，离 P 市中心城区 24 公里。N 村辖 15 个村民小组，土地面积 26.5 万 km²，在册人口 425 户、1702 人，主要居住着彝、拉祜、哈尼、白、傣族等 5 个少数民族。

2.1N 村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

以前的N村里的人们主要靠种田，找菌子，伐木赚钱。那个时候的村民收入不是很高。农闲时节，村子的男性和女性均外出务工，主要在离家较近的P市中心城区、N县城等地建筑工地当农民工。女性一天的酬劳是80元左右。少数人则会去离家较远的福建省、浙江省等地当农民工。农忙的时候，家里的女人一般在早上六七时就会先起来做家务和早饭。男人起床相对较晚，他们起床后通常就是坐着抽烟或者喝早茶。两个人八点左右一起出门干活。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通常都是老人带小孩，要是家里没有老人，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就会把小孩一块带着出去。中午十二点左右回家吃午饭，然后又接着出去干活。晚上回来后，一般是女人做饭，男人饲喂家里的牲畜。晚饭结束后，女人继续未完成的家活或者串门子。休息时间大致都在晚上九点左右。以胶耕地都用牲口，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割时还需要邻里间相互帮衬。

2.2N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实践

2.2.1 女性是家庭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常规家务活动方面，随着电、水、网络及村寨道路的建设，N村里家家户户都购买新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传统的挑水、砍柴、割猪草等诸如此类的家务劳动已经不再进行。常规的家庭清扫和一日三餐等则是夫妻双方共同完成，有老人的家庭则是老人帮着完成。在赡养老人方面，由夫妻双方共同照顾和赡养，这能使女性村民获得更多的认可。在教育孩子方面，多数由母亲完成，由于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母亲对于辅导孩子功课仅限小学三年级以前的水平，后期则更多地依赖学校和网络上的课程辅导，她们把对于未来的发展期待更多地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在走亲访友——维护邻里关系角色扮演方面，村子里有过年杀年猪、请吃杀猪饭的习俗，相互帮忙的依然是以女性村民为主，男性村民只负责把猪杀好，其他清洗、做菜等工作都是由女性村民完成。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女性村民会交流自己外出打工的趣事，亦或是在外工作的生活情况等。这部分角色所需技能多数是家庭的言传身教，母亲对女儿或者是婆媳间的教授。

2.2.2 女性是农村经济活动的重要承担者

在茶地种植经营活动方面，男女之间有一定的分工，女性为主要劳动力，采摘茶叶大部分由女性完成，而茶地施肥等管理工作男女都做。一般而言，背、扛等体力活由男性来完成，采摘、弯腰等灵活度大的精细活由女性来完成。如果家里忙需要请工帮忙采茶，请的也是女性工人。受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茶叶等市场信息影响，村民都积极学习茶叶生态种植和采收技术。一方面，村民参加政府组织的生态茶园建设培训。另一方面，村民自己依靠网络学习生态茶园种植技术和了解茶叶销售价格信息。在野生植物资源采集方面，男女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工。如在野生菌大量生长的季节，夫妻两人会很早就打着电筒上山找菌子，顺带地采摘些时令野生蔬菜。野生菌的市场价格较高，是N村村民季节性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旅游业带动的经济活动方面，政府对N村进行了地震恢复重建，乡村旅游在N村得到快速发展，政府致力于将N村打造成为一个乡村旅游兼具民族特色的景点，尽可能地重现N村当年茶马驿站的古朴与欣欣向荣的景象。旅游业带动N村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餐饮，主要劳动承担者是女性村民，她们开发了主要传承于赶马人的“八大碗”菜式，并配合当地如野生菌、火镰菜等特色时令野菜。这些菜式保留了当地文化特色，吸引各方游客来用餐。

2.2.3 女性是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N村在召开村民大会时，通常都在村里小学广场上举行，可以在会上见到很多女性参加会议。由于N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寨，公共场合的交流很少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大家都用汉语方言交流，彼此能够听懂。调查发现，N村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从参与人数和参与率来讲是增多了，公共事务的性别参与率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N村女性的声音仍然很少听得见。换句话说，她们并没有在会议上发言，原因是“作为妻子、媳妇不能多嘴多舌”传统的理念仍然影响着她们。

2.2.4 女性是接受培训的最多参与者

N 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除了茶叶之外，就是随着乡村旅游业开展起来的餐饮业。政府在推动发展 N 村乡村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分别引入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以及旅游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参与者主要是女性。N 村的大多数村民认为，这些事务平时都是以女性打理为主，相关的培训女性听得懂、学得快，自然应该由女性参加。通过这些培训，女性返家再培训或者教授给家里的其他人，主要包括家里请的小工。由于小工打工时间较为随意，人员变动大，故而小工一般不直接参加村里的相关培训。

3 农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的运作逻辑

3.1 乡村振兴社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与外界交流

N 村村民原本是住在附近的山里，最初沿着公路两边居住的村民只有两户，这两户也是最早发展餐饮业的当地人。调查发现，这两户的女主人均能很好者进行交流，并有自己的思想，对自家餐饮店及在普洱市内上学的孩子的发展都有着不小的期望。他们共同的期望是子孙能多读书，多出去看看。2007 年 N 县大地震之后，村民陆续从山里搬迁出来，加上政府对 N 村进行特色小镇打造以发展乡村旅游，村子里的人家基本上都在做着类似的小生意，如餐饮、住宿、销售特色小吃等。目前乡村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为了提高收入，女性村民与家人一起在游客面前制作“糯米粑粑”，与游客交流这种粑粑以前制作方式与现在的区别。餐饮店的老板娘会向游客推介周边旅游点和特色吃食，也会推销自家的特色菜式。由于 N 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子，过去彝族人过火把节、哈尼族人过新米节，其他民族的村民也会积极参与。现在 N 村都每年举办旅游文化节，这是政府为 N 村乡村旅游开发打造的新项目，有民族歌舞表演和传统的划拳赛、摔碗酒赛等项目，有很多游客参与其中并乐此不疲。这些节日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提升 N 村当地的知名度，因此在整个节日举办过程，村民都积极响应配合。女性村民在与游客交流时显得更为热情，语言表达上也更为流利。以前碍于普通话不标准和说太多话会被村子的人嫌弃，N 村女性村民很少与外来者交流。现在问个别女性销售者，以前与外来者交流会害羞现在是否还会害羞？她们笑笑说很多时候还是害羞的，但要把东西卖出去挣钱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3.2 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变化，使得女性不得不学习新的生存技能

N 村村民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可分为三类：由于搞旅游开发和修建公路，村寨已经没有多余的良田用来耕作，部分村民从原来的种田变为现在的以做经营客栈餐饮和其他小生意为主；大多数村民已经不种地了，而是以种植茶叶为主；还有部分村民则是靠在 P 市中心城区、N 县城等附近打工或者就在村寨里打工获取收入。如前所述，N 村女性村民积极参加政府组织举办的诸如餐饮、住宿、旅游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培训。除些之外，还有村民自费“走出去”到省外发达地区去学习。村寨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几户人家的女性结伴去浙江、上海等地学习外地人如何经营客栈食宿生意和如何开展乡村旅游。

3.3 外出务工者纷纷返回村寨，把学到的新理念新技能活用于村寨发展

N 村村民现在很少外出打工，他们认为现在道路条件好了，居住条件也就好了，而且觉得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家里发展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一些曾经出去打工返回村寨的人，知道一些老物件正在消失或减少，如哈尼族的织布机和传统的哈尼服饰以及过去用过的石磨等劳动工具。他们就想着把这些老物件收集起来并加以展示，现在整个 N 村体现出来的风情就如同一个行走中的博物馆，随时可以见到过去生活的印记。另外，部分村民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优势，模仿外地的模式纷纷在自家的地里建设葡萄园、李子园等亲子采摘园，吸引了 P 市中心城区和 N 县城等部分居民前去消费，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定的收益。

4 结论与建议

N 村女性社会角色重构的实践表明，政策、经济、教育力度的加强和积极的导向，均对农村女性角色重构起到重要的影响。当新兴事物兴起时，特别是该事物与家庭经济收入息息相关时，N 村女性村民表现得更为积极。从 N 村女性村民克服语言障碍，积极参与政府引进的各种培训就可见一斑。虽然不能说明农村女性接受新兴事物能力更强，但能说明农村女性更为关注家庭发

展，特别是当新兴事物与家庭生活能够很好的融合时，即使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女性表现出来的兴趣及学习能力都让人惊叹。农村女性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并没有表现得手足无措，而是积极努力地学习，让自己更快地适应外来文化。虽然家用电器的普及使用，使得农村女性从繁重的家务角色中抽身出来，但是她们没有因此而闲散。她们用多出来的时间陪伴孩子，关注孩子的教育，同时也学习新的技能。互联网的发展给农村女性带来更多的信息，也让她们更多的机会与外界交流。在开始改变的时候，农村女性可能会觉得害羞，但逐渐通过与村寨内部其他女性的交流，大家都产生了共鸣并愿意为家庭、为孩子的教育等而去积极改变。也许会有部分老年人说道，但绝大多数男性村民特别是自己的丈夫还是支持 N 村女性村民的这种变化。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建议政府加强关注两性平等的顶层设计机制，为农村女性村民搭建发展平台，对整个乡村振兴建立积极正向的价值导向；通过加强妇联等基层组织建设，让农村女性村民在政策上有娘家的支持，进一步发挥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优势，抱团发展。同时，可结合地方高校主动融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为当地两性提供他们所需的技能，分性别地进行科技服务并建立当地人的文化自信。由于生理性别差异使得两性之间的需求、发展存在差异，但是男女共同发展愿望是一致的。2020 年以来，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到 N 村旅游的游客减少，但是 N 村村民积极通过网络对乡村土特产和村寨人文风情进行宣传和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N 村女性村民也开始对以前只是男性村民感兴趣的电商等领域产生了兴趣并自发地进行学习。同时，N 村年轻的女性也会通过手机来获取新的资讯和技能，自发地把现有的与之前的生存生活技能进行比较，并与其他村民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互联网的利用成为了农村女性扩大对外界认知的主要手段。她们通过“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了解其他女性在同一事件中是如何处理和理解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她们产生共鸣和信心。建议政府联合地方高校，对农村村民特别是女性村民进行电商等领域的培训。考虑到 N 村主要经济收入结构的因素，让村民长时间外出参加培训是不现实的，可采取把培训办到村寨田间地头的方式，让更多的村民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地接受培训，以进一步提升广大农村村民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素养和能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 全国妇联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EB/OL]. (2018-2-2)[2021-02-28].
- [3] 东波，刘同玉. 赋权增能：后脱贫时代农村女性多维贫困干预路径选择[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
- [4] 任大鹏，王俏. 产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妇女土地权益保护[J]. 妇女研究论丛，2019(01).
- [5] 赖力.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
- [6] 黄令贺，朱庆华. 社会角色视角下网络社区用户类型及其关系的识别[J]. 情报资料工作，2013(02).
- [7] 秦启文. 角色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8] Jahnke I. Dynamics of social roles in a knowledge management communit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4).
- [9] 王鹏，吴愈晓.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J]. 社会学评论，2019(02).
- [10] 赵金子，周振. 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及其治理——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
- [11]董静, 赵策. 家庭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研究——兼论人缘关系的替代作用[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01).
- [12]朱月季, 张颖, 陈新锋.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 CHIP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13]赵灵芝. 农村女性人口特征及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 宁夏社会科学, 2014(02).
- [14]李敏, 刘淑兰.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及引导路径[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4).
- [15]李亚妮. 农村妇女参政中家庭资源与性别身份的博弈——基于陕西 H 县的个案研究[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9(03).
- [16]吴巧红. 女性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 旅游学刊, 2018(07).
- [17]蔡弘, 陈思, 黄鹂. “男工女耕”下务农妇女生活满意度研究——基于安徽省 1367 个女性样本的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02).
- [18]邓爱民, 潘冬南. 乡村女性旅游创业行动者网络构建研究[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2).
- [19]陈慧, 谷小科. 娄底市全域旅游开发对农村女性的影响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13).
- [20]覃海丽. 家庭支持对乡村女性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D]. 泉州: 华侨大学, 2020.
- [21]周萍, 赵康生, 蔺楠. 性别平等环境与农村女性的创业绩效——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产经评论, 2019(02).
- [22]罗海云, 刘泽锋. 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逻辑与实施路径[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2).
- [23]郑祥玉. 农村老龄化、女性化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路径研究[J]. 中国产经, 2020(14).
- [24]李清. 宁洱县那柯里村景观特色研究[D]. 昆明: 西南林业大学, 2015.